
日本国民性研究

张建立*

中国既是一个崛起的大国，亦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和平崛起，尤其要处理好亚太地区的大国间关系以及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以确保和平发展的环境。日本既是亚太地区的大国，也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重要周边国家。在中日关系依旧严峻的今天，梳理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不仅有助于创新日本国民性研究的学科范式，规划未来的研究方向，而且将为创造性地构建新型的中日关系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即使是在被称为中日关系蜜月期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对日本双边贸易进出口总值也不过 5 万亿日元。而今，据 2015 年 1 月 13 日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信息，2014 年中国对日本双边贸易进出口总值为 1.92 万亿元（约合 36.5 万亿日元）。^①虽然比 2013 年略降，但也足以显示出中日经济关系依存度之高。1978 年双方人员往来尚不足 5 万人次，2012 年增长到近 500 万人次。据《朝日新闻》1 月 9 日报道，2014 年 1 月至 11 月，赴日中国游客高达约 222 万人次。^②遗憾的是，中日经济高度依存并未能阻止彼此的关系恶化，密切的人员交流也未能改善国民感情。2014 年 9 月 9 日由中国日报社和日本民间非营利组织“言论 NPO”共同发布的第十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人对中国“没有好感”的比例达 93%，中国人对日本“没有好感”的比例为 86.8%，两国公众对两国关系现状认可度达近十年最低。日本内阁府的《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报告书》数据亦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抱有不亲近感的人自 1981 年以来开始逐年增加，2014 年 10 月的调查数据显示已经高达 83.1%。这成为内阁府自 1978 年开展此项调查以来的最高比率，而且是自 2012 年以来连续三年超过 80%。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比邻而居，但居相近，心相远。中日国民感情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多，而缺乏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①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6/info729729.htm>。

② 参见《日本商家“战场前移”争夺中国游客》，《参考消息》2015 年 1 月 10 日。

相互理解则是重要原因之一。从社会层面与心理层面，进一步加深对日本人的交换模式、集团缔结模式、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等国民性方面的研究，无疑对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互信，有效地改善中日关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一 何谓国民性

研究日本国民性，首先要明确何谓国民性？中国学界曾流行这样一种认识，“国民性”是一个日本名词，肇始于近代日本，后来这一词汇经梁启超等人传入中国，成为中国近代语言乃至现代汉语词汇之一。中日两国学者之间对这个实际上几乎并没有经过实证检验的所谓“常识”并不存在异议。至今，日本国民性研究论著多达数千种。但是，学者们的着眼点大多是被称为国民性的内容本身而非表述该内容的名词。因此，也鲜见有学者对国民性的词源及其生成与演变过程等问题进行探讨，大多是各自给出一个很笼统暧昧的界定。有学者指出，国民性概念的分歧与不确定已经成为国民性研究深入发展的最大障碍，并尝试着通过与人格、人性及民族性概念的比较来对国民性概念进行了界定。^① 这一学术努力，虽有助于人们从哲学思想层面来理解国民性概念，但因欠缺对“国民性”词源及其生成与演变过程等问题的解析，难免还是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李冬木教授2007年发表于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论集》第91期的《“国民性”一词在中国》、2008年发表于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论集》第92期的《“国民性”一词在日本》，在近代思想史的背景下调查研究了作为汉语的“国民性 = guómínxìng”一词是如何由英语“nationality”（或 national character）被翻译成日语的“国民性 = こくみんせい”，及其又是如何进入了汉语语汇的传播渠道。

李冬木教授指出，根据现有文献，“国民性”在日语中作为一个词语的出现，远远滞后于这个词语所表达的含义。“国民性”是日语对英语“nationality”长期翻译消化吸收的结果。该词在日语中的最早使用时间为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李冬木教授把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之后的十几年看作该词的滥觞和普及期，其标志分别是《国民性与文学》（1898）和《国民性十论》（1907）。直到大正时期该词被正式收入各种现代辞典，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英语“nationality”的日译词都不是以“国民性”而是以其他方式来表述的。战争

^① 参见袁洪亮：《“国民性”概念的界定与辨析》，《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

进一步强化了明治以来的“国家”、“国粹”、“国权”、“民族”即所谓“nationalism”意识，从而催生了“国民性”一词，但仍为现在留下了汉字和外来语两种形态，即“国民性”和“ナショナリティー”。在“国民性”这个词在日语中急剧膨胀的 20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思想鲜活的留日学生成为将该词积极带入汉语的传播者。根据现有文献判断，可把 1903 年定为“国民性”一词进入中文文献的元年。清末民初最具影响力的梁启超、严复和章太炎均非“国民性”一词的在中国的传播者。^①

另外，“国民性”的词源“nationality”，本是西方文化人类学研究规模小且单一社会形态时所创出的术语。在西方，国民性研究的产生，最早应追溯到心理学家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后来，一批人类学家继承了冯特的研究方法，把心理学引入人类学，开创了文化人类学，国民性研究成为其中的文化与人格学派的重要研究领域。他们不再使用“民族心理”这一概念，而是用“国民性”这一术语取而代之。^②人类学家始终坚持以研究落后民族为职志，随着“原始社会”逐渐现代化，以及地区研究兴起的影响，如今已把重心转移到国内的少数民族。“国民性”一词本身虽然无褒贬之意，但由于其内容本是指称所谓未开化民族特性的词，所以也就暗含了一些贬义的成分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考虑，它被一些学者称为是殖民话语或也不为过。^③

结合“国民性”的词源，以及在中日思想文化中的传播演化过程，我本人更倾向于将其界定为主要由心理方面的情感和自我认知以及社会方面的交换和集团这样四个维度构成的统合体。它是一个人的系统，类似于一种文化基因，不会轻易改变。心理文化学称之为“基本人际状态”。^④一种文化的交换模式、情感模式、思维方式、自我认知特点等皆为国民性研究领域的重点关注问题。

二 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目的

日本国民性研究一直都受到全世界国民性研究者的关注。但是，各国学

① 参见李冬木：《“国民性”一词在中国》、《“国民性”一词在日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4 期。

② 参见罗教讲：《国民性研究方法之探讨》，载李庆善主编：《中国人社会心理研究论集》，香港：香港时代文化出版公司，1992 年，第 88 页。

③ 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修订译本）》，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第 2 章。

④ 参见尚会鹏：《“基本人际状态”的类型、维度与“心理—社会均衡”（PSH）的动力学关系——对许氏理论的若干阐释和补充》，《国际政治研究》2007 年第 3 期。

者研究日本国民性的目的却不尽相同。

（一）美国学者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目的

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成果上，美国学者的日本国民性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兴起之初，就是一种应运而生的集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并且更倾向于应用性研究，其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得对日战争的胜利。众所周知的《菊与刀》，就是本尼迪克特运用其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的重要研究成果。它的诞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者受美国战时情报局的委托而提交的一份关于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报告。它不仅是本尼迪克特把研究国民性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成果，也是西方的国民性理论首次直接应用于现实问题研究的杰出范例。

当美军对日本进行战后管理时，很多相关研究开始转向以如何有效地管控日本为目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从意识形态等方面对抗马克思主义理论，且因此一度催生了日本国民性研究热。“在冷战正酣的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的统治阶层都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定义为砸碎一切的理论。因此，在日本发展史中，美国的学术界不失时机地把原因侧重点放在了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循序渐进的变革上。在此时代背景下，如何回应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决定社会变革方向的最关键因素是阶级对立的观点，就成了美国的日本研究学者们的当务之急。把文化与传统作为日本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打造新课题，就产生于这一历史背景之下。重温这种理论背景，可以明白 60 年代后期到 70 年代前期日本文化论和国民性论在日本和世界同时走俏的意义。”^①

（二）日本学者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目的

日本学者关于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目的，起初大多仅仅是为了单纯地对本民族人的各种性格予以赞美，提振民族士气而已。在日本学者关于其自身的国民性研究论著中，首次冠以“国民性”之名的著作，当属 1907 年 12 月由富山房出版的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这是一本迎合美化日本的时代要求的著作。在该书中，芳贺矢一把日本国民性分为十项，即忠君爱国、尊崇祖先重视家名、讲求现世务实、热爱草木喜欢自然、乐观洒脱、淡泊潇洒、精巧纤细、清净廉洁、重视礼仪、温和大度这样十个项目来加以描述。但是，芳贺矢一对于其得出的这十个特点都是仅凭借个人生活经验等进行的直观、

^① 罗斯·摩尔、杉本良夫编著：《解读日本人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6 页。

零散的描述，并未经严密的资料考证，也谈不上有什么理论支撑。

虽不能说是刻意迎合，但事实上美国的部分日本国民性研究者的目的，与日本国内的日本国民性论者的目的，在很多方面都不谋而合。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国内学者积极炮制的日本人论著，“看似非政治的、文化的、中立的言论，实际上与各时代的权力关系及论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很深的关联。这些言论间接地、无意识地、隐含地反映了日本社会各集团的利害关系。认为日本特殊独特论大都维护了日本统治阶级、权力阶层、精英群体的利益，并且从这个意义上认为日本人论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并不是无稽之谈”^①。

此外，日本学者探讨自身的国民性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破解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日本作为最早实现近代化的亚洲国家，随着其国际地位的变化，“日本本身，在国际社会中已陷入深刻的‘民族认同危机’之中”^②。“日本人在痛苦地思索，他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是否使他们成为亚洲人，而他们的财富、民主制度和现代化生活是否使他们成为西方人。”^③ 日本社会的形形色色的日本人论，很多正是被这种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意识催生而出的。

（三）中国学者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目的

中国学界研究日本国民性，既不是为了帮助日本人化解其身份认同的危机，亦更不是如日本和美国那样欲寻求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概言之，是为了满足国家内政外交的需要，起到对中国读者和民间以有效的告知和引导。截至 20 世纪末，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目的，大多是想探讨促使日本近代化成功的、日本人独有的国民性，并希冀能有所借鉴。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学界步入了对日本国民性研究的反思期，开始逐渐摆脱以往因对日本国民性优点的盲目探求而一味给予溢美之词的做法，已经基本能够做到对日本国民性予以一分为二地剖析，甚至有的还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出现了一些缺乏严谨的学术论证、对日本国民性的批判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文章。此外，也有的文章除梳理既往研究中提到过的日本国民性的一些特点之外，更多的是进行学理分析。当然，这些学者依旧将“实用主义”、“集团主义”、

^① 罗斯·摩尔、杉本良夫编著：《日本人论之方程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71 页。

^② 尹健次：《近代日本的民族认同》，武尚清译，《民族译丛》1994 年第 6 期。

^③ 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年，第 10 页。

“等级秩序”视为日本国民性，这种看法是否妥当则有待商榷。其实，对诸如此类的日本国民性论，早在1995年杉本良夫与罗斯·摩尔就已经进行过严厉的批判，并且一再强调：“日本社会与其他产业社会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差异，即欧美社会也有集团主义倾向，日本社会也存在不少个人主义因素”，那些曾被认为是日本人自然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其实“是社会结构和制度规范的产物。”^①

三 日本国民性研究关注的问题及研究方法

中国学界的日本国民性研究因受当初的研究目的所限，导致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有所偏颇，尚未能照顾到国民性概念涵盖的所有内容。而且，缺乏对相关研究方法的探索，主要还是在沿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近几年才出现用心理文化学等研究日本国民性的新方法。

（一）日本国民性研究关注的问题

迄今为止的日本国民性研究，除了部分笼统性地概论日本国民性的论著之外，从有关国民性四个构成维度来看，最初大多比较倾向于对社会方面的集团维度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30余年来，题名中含有“日本型”、“日本式”、“日本模式”且其内容几乎千篇一律地论及日本人的“集团主义”、“集团意识”、“行为模式”等问题的文章加在一起，大约占了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30年间发表文章总数的二分之一还多。对于国民性含义中社会方面的交换维度^②、心理方面的情感^③和自我认知维度^④的研究成果非常欠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体系的变迁，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中日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如前文所述，高度依赖的经贸关系和密切的人员往来都难以阻止中日关系的恶化，国民感情坏到最低点。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的形成？为何部分日本政治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一再出尔反尔？为何日本民众在历史认识等问题上与右派政治家的认同意识在日趋增强？很多日本思想文化研究成果难以回答这个问题，遵循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也难以有合理的解释。一种政治思想无论是“右”还是“左”，从国民性的视

① 参见罗斯·摩尔、杉本良夫编著：《日本人论之方程式》，第13页。

② 如尚会鹏：《论日本人的交换模式》，《日本学刊》2009年第4期。

③ 如尚会鹏：《论日本人感情模式的文化特征》，《日本学刊》2008年第1期；张建立：《日本人与中国人的感情模式特征简论》，《日本学刊》2009年第6期。

④ 如尚会鹏：《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日本学刊》2007年第2期。

角来看,其归根到底都是一种自我认知的体现,是一种行为模式的选择,是一种价值观的甄别。仅凭一些表面的政治现象等进行或左或右的简单判别,既不能究明右倾化产生的原因,亦难以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更难以前瞻其未来走势。笔者曾尝试从国民性的视角来解决这些问题^①,但由于对国民性心理层面的相关维度研究积累不足,研究尚有待提高。

(二) 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方法

研究日本国民性的方法,一般而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哲学方法论。从这个层次上讲,研究国民性主要有经济学方法论、社会学方法论、心理文化学方法论之分。经济学方法,又被称为理性选择的研究方法。它假定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是理性的,唯一试图获得的就是从事经济行为的利益最大化。许多学科的理论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之上,如目前国际关系学界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管理学的科学管理理论,实质都是奉行经济学方法论。目前,比较有说服力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方法,则是由文化人类学的文化与人格学派演化而来的心理文化学的方法理论。^②

第二个层次是研究的方式方法。这个意义上的方法与学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历史学方法、伦理学方法、比较方法等。其中,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研究日本文化、日本国民性所必需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不过,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领域,单纯应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多,较具代表性的著作有汪向荣的《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③等。

第三个层次是微观意义上的方法。这种方法比较具体,类似统计、调查问卷等方法。运用统计学的手法进行日本国民性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日本,即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或个案访谈等获得的第一手材料进行国民性研究。日本统计数理研究所国民性调查委员会和日本广播协会在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日本国民性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比较大。统计数理研究所国民性调查委员会,从 1953 年开始至 1988 年间每隔五年就进行一次关于日本国民性的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编辑出版了《日本人的国民性》。日本广播协会广

① 如张建立:《日本右倾化现象的国民性解读》,《日本学刊》2014 年第 5 期。

② 关于心理文化学的发展历程、学科定位及相关理论阐述,请参阅尚会鹏、游国龙:《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台北:南天书局,2010 年)以及尚会鹏《心理文化学要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③ 汪向荣:《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播舆论调查所，从1973年开始每隔五年进行一次关于日本人意识的调查，并且也将调查结果编辑成书。近些年来，如《读卖新闻》等日本的新闻媒体，也开始注重通过舆论调查等来分析日本国民性特点。^①

总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获得可资凭信的科研成果，就必须依凭科学的研究方法。目前，“寻找和探索国民性研究的科学方法乃是全世界国民性研究者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难题”^②。研究日本国民性，若能将上述三个层次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使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相得益彰，必将有助于获得关于日本国民性特点的更准确的分析。

四 日本国民性研究的展望

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从心理层面，整体地把握日本国民性的特点，分析其对日本制定内外政策的影响，前瞻其国家未来发展走势，都可提供重要的分析视角，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实践意义。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就非常重视从国民性视角对一国的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的分析，他把国民性归类为决定国家强权的纯粹的人的质量因素之一，并称其特别难于合理地预测，而且它们对一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具有持久的、决定性的影响。作为一个“国际舞台的观察者，要想估计不同国家的相对实力，就必须考虑到国民性，不管要正确估价这个如此难以捉摸和无形的因素是多么困难。不这么做，就会导致判断上和政策上的错误。”^③富有真知灼见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不仅有益于稳妥地处理中日关系，而且在全球化突飞猛进的今天，对处理有日本介入的他国关系也必定能够提供重要参考。

从对中国学界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现状的梳理结果来看，无论是在日本国民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上，还是在対日本国民性主要特点的剖析方面，《日本学刊》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学术平台作用。篇幅所限，对其贡献无法一一评述。值此创刊30周年纪念之际，衷心感谢《日本学刊》各位编辑人员为之付出的辛劳，同时也衷心地期盼日本国民性研究能够在《日本学刊》这一重要学术平台的培养下取得更大的成绩，并在其大力推介下走向世界。

① 読売新聞社世論調査部編集「日本の世論」、弘文堂、2002年。

② 罗教讲：《国民性研究方法之探讨》，载李庆善主编：《中国人社会心理研究论集》，第87页。

③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181~182页。